



胡適的「壇經考証」

蔡惠明

胡適先生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六二）字適之，安徽績溪人。一九一零年赴美，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，是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。一九一七年回國，任北京大學教授，曾提倡文學改革，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。一九一九年發表「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」論文，提出「大胆假設，小心求證」的研究方法，對學術界頗有影響。他還編寫過「中國哲學史」，半途輟筆，因為他當時不懂佛學，寫不下去了。

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，胡適寫了「壇經考之一」是作為「曹溪大師別傳」跋文的。後來又繼續撰作「壇經考之二」，（「記北宋本的『六祖壇經』」）對被認為是中國禪宗的宗經——「六祖法寶壇經」進行了一番考證，雖然有些觀點屬於牽強附會，但有些見解確也有獨到之處。今試作介紹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六祖大師圓寂後，「壇經」幾經竄改，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本子。胡適在「壇經考之一」中寫道：

「我們試取敦煌本『壇經』和明藏本相比較，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。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，內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後陸續增加進去的。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採自『曹溪大師別傳』的。」他列舉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、機緣第七、頓漸

第八、宣詔第九、付囑第十等五處與「別傳」對勘，發現有很多變動。他因此得到結論說：

「我會細細校勘『壇經』各本，試作一圖，畧表『壇經』的演變史：

『壇經』古本——宋至和三年（1056）元至元辛卯（1291）
（敦煌寫本）——契嵩三卷本——宗寶增改本——明藏本
『曹溪大師別傳』——

從上表可以看到，胡適是根據宋郎簡「六祖壇經序」中所說：「更二載，嵩果得曹溪古本，校之，勒成三卷」而言的。但現存的契嵩本「壇經」只有一卷，沒有人見過「三卷本」的契嵩本「壇經」，恐怕連胡適自己也不會見過。

還有，胡適認為「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」，這是不妥的，因為明藏本壇經，並非一種，不能把契嵩本稱「明藏本」。而且「曹溪大師別傳」也不能與「壇經」並列，因為它不是一種不同本子的「壇經」。還有在「壇經考之二」中被胡適認為「是人間第二最古的『壇經』」的惠昕真本，他却未列入「表」內，在為表明

「壇經的演變」史而作出的幾種不同本子的「壇經」的圖表，竟然沒有這本「人間第二最古『壇經』」，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疏漏。

印順老法師在他所著「中國禪宗史」第六章「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」中說：

「『壇經』的各種本子，從大類上去分，可統攝為四種本子：敦煌本、古本、惠昕本、至元本。」

敦煌本就是敦煌寫本，亦即法海本。印老認為它雖「已不是『壇經』原型」，但却是「現存各本中最古的」，特別是關於六祖事跡的記載「最為古樸」。而「古本」則將「別傳」的傳說編入，又將六祖與弟子們的問答機緣也採錄進去，「這雖被稱為古本，而成立的時代要比敦煌本（七八〇—八〇〇），別傳（七八一），寶林傳（八〇一）遲些。且這一古本，「是從古人記述中知道其存在的。」惠昕本，係「參考古本而改編成的，所依底本，近於敦煌本」。至元本，包括德異本和宗寶本。印老列舉的四種本子中，沒有契嵩本，但在敘述中也談到了契嵩校改「壇經」的事實。

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「禪宗史研究」中指出：「在現今的『壇經』裏，大體可分為敦煌本，惠昕本，德異本——宗寶本的三個系統。」宇井把德異本說是「亦即曹溪原本」，其實所謂「德異本」，不過是契嵩本的又一種傳抄本而已，因此確切地說，「三個系統」實則是敦煌本（法海本）、惠昕本、契嵩本和宗寶本「四個系統」，其餘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傳抄本吧了。胡適的考證與他作的圖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。

胡適在「壇經考之二」中在對敦煌本（一萬二千字），惠昕本（一萬四千字）和明藏本（即契嵩本，二萬一千字）三本「壇經」的字數作了一個統計比較後說：「這可見……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胆真可令人駭怪了。」他還說：「惠昕增添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，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。……惠昕改動的地方，大致都是這樣『添枝添葉』的增加，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，也有改換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。」胡適認為：

「總之，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，但不失為『去古未遠』之本，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『壇經』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

的，那些部份是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。」

胡適的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歷史觀點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但他在「壇經考之二」中又堅持說「壇經」係神會所作，却是荒唐而沒有根據的。

印順老法師在「中國禪宗史」中提出兩種見解：一、「『壇經』是先後集成的，並有過修改與補充。」二、「從『壇經』原本到敦煌本，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補，此後流傳中的『壇經』，不斷的刊行，變化是非常多的。」印老對某些本子「壇經」的一些內容，竟然「大致與『景德傳燈錄』相近」感到驚異。他又指出：「現存的『壇經』應分別為二部份：一、「壇經」主體，是大梵寺開法紀錄。二、「壇經」附錄，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，臨終付囑，以及臨終身後的情形。二者性質不同，集錄也有先後的差別。在『壇經』的研究上，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。」這種分析，對從事「壇經」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的。

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在「禪學思想史」中對三本「壇經」的不同會說：「作為慧能語錄的『壇經』，由於傳寫時文字的改換，以致在『壇經』裏存在着『玉石相混』的情況。可見在『壇經』晚出的本子裏，確有贗品和私貨，這是中外學者所公認的。」

胡適在「壇經考之一」中對「曹溪大師別傳」作了一番考證之後，最後寫道：

「總之，『別傳』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，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，裝上許多年月，儼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。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，下筆便錯，處處露出作偽的痕跡。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，把此傳認作『曹溪古本』，採取了不少材料到『壇經』裡去，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！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了這一本，保存至今，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。我們對於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，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。」這段話倒是很客觀、中肯的。

據說，胡適先生在晚年，對佛學也曾有過濃厚的興趣，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，可惜筆者手頭沒有可供引用的參考資料，待以後有機緣再作補充吧！